

沙博理的中国文学外译观探究

刘红华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通过分析沙博理的18部代表性译作,发现沙博理在其整个翻译生涯中始终保持着浓厚的中国情怀、明晰的目的语读者意识以及适度的调和策略。具体而言,沙博理在翻译中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的赞颂之情及对中国文化的欣赏与热爱之情。其翻译精准把握了中西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充分关照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接受能力,对译文的忠实性与可接受性进行了合理的平衡,对中西语言与文化进行了适当的调和。

[关键词]沙博理;中国文学外译观;中国情怀;读者意识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8)05-0117-06

Exploration on Sidney Shapiro's Views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LIU Honghu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comparison analysis of Shapiro's 18 translated works, this article finds out that Shapiro always maintains his deep love for China, keeps clear readership awareness and adopts harmonic strategies. To be specific, in his translation, Shapiro expresses his admiration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well as his appreciation and love for Chinese culture; he master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 and culture; he pays obvious attention to the target readers' reading habits and interests; he achieves a sound balance between the faithfulness and the acceptability of the translated texts as well as arrives at an appropriate medi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 and culture.

Key words: Sidney Shapiro; views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love for China; readership awareness

著名美裔中国籍翻译家沙博理可谓中国文学翻译界的巨擘之一。他致力于中国文学的英译和传播事业50余年(1949—2002年),英译中国文学作品200余部,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英译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沙博理先后担任对外文化联络局、外文出版社等国家政府机构译员、外国专家,是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典型译者。对沙博理的中国文学外译观进行研究,对新中国半个多世纪外译活动

特点的归纳以及选择、培养合格的外译者具有重要意义。

沙博理曾多次公开表示其热爱中国及其文化,在翻译中也表现出浓厚的中国情怀。^{[1]448}同时,他认为,译文是否“好懂”是决定译作是否忠实于原作的关键,^[2]在翻译中表现出明晰的读者意识。另外,沙博理曾表示,翻译像在原作与读者之间“走钢丝”,倒向这边不行,倒向那边也不妥,他认为在翻

收稿日期:2017-07-10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沙博理的中国文学外译观研究”(17YBQ042)

作者简介:刘红华(1983-),女,湖南永州人,湖南工业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翻译学、中国文学外译、译者研究。

译中应努力调和原作和读者以及中西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3]本文通过分析沙博理的18部代表性译作,发现沙博理在其整个翻译生涯中始终保持着浓厚的中国情怀、明晰的目的语读者意识以及适度的调和策略。

一 浓厚的中国情怀

沙博理曾表示自己对中国的情感比对生他养他的美国还要深。^[4]他热爱新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在翻译中无处不渗透着浓厚的中国情怀。沙博理对中国共产党的情怀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情怀表现得最为明显。

(一) 浓厚的中国共产党情怀

沙博理与中国人民一起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他欣赏并支持中国共产党。沙博理本人曾表示对共产党的依赖与信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向往与憧憬。这种崇敬中国共产党的情怀在沙博理的翻译中有明确的体现,如强化和显化中国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弱化其负面形象等。

沙博理通过强化、显化中国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来表达对他们的赞赏之情。沙博理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革命战士、先进共产党员、农村进步人士等群体中的英雄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突出他们英勇无畏、百折不挠、出生入死、质朴谦逊、不怕艰辛、敢于抵抗恶势力的可贵精神。这些英雄人物包括《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活人塘》中的刘根生、《小城春秋》中的吴七等革命战士以及《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等年轻的先进共产党员等。沙博理在翻译中通过增译、减译、释义等各种翻译技巧,来显化革命战士以及社会主义新青年的正面形象,弱化甚至隐去他们的负面形象,以体现自己对牛大水等共产党员的高度赞扬;通过增译来显化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国民党及地主等势力的恶劣行径,以反衬中国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

(二) 浓厚的中国文化情怀

沙博理热爱中国文学与文化。沙博理的翻译目的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其翻译观中体现出浓厚的中国文化情怀。沙博理对中国文化的浓厚情怀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语言形式的保留和中国文化意象与内涵的忠实传达上。

(1)通过序跋、脚注、括号注释等副文本,补充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背景知识,在让目的语读者充

分理解原作的思想与原作中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内涵的同时,尽可能地向目的语读者传达更多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如在其编译作品*A Sampler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Mao Zedong*(《中国文学集锦:从明代到毛泽东时代》)中,沙博理介绍了这部编译作品原作创作背景,他说:“对于大体的背景,我会稍微提及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描述一下孕育中国文学的几个历史时期以及介绍一下作者和我们这个译文集中所收录的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5]在前言(prologue)中,沙博理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简单介绍,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唐朝的诗歌、元朝的戏剧、明朝的四大名著等长篇小说,到现当代的战争革命小说等均有涉及。这些副文本为目的语读者呈现了中国文学概况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坛风云变化。此外,沙博理在其译作*Deng Xiaopi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 Daughter Recalls the Critical Years*(《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通过译者导言(Translator's Introduction)、术语表(Glossary)、脚注和括号注释等副文本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

(2)尽量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文化负载词中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内涵。从沙博理不同时期所译的四部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活人塘》《小城春秋》和《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共统计得到文化负载词222例。沙博理对这些文化负载词采取的翻译方法包括:音译(3例)、音译+文外释义(23例)、音译+文内释义(4例)、音译+文内文外释义(1例)、直译(120例)、直译+文内释义(13例)、直译+文外释义(11例)、直译+音译(2例)、直译+音译+文外释义(1例)、省译(2例)、意译(42例)等。省译与意译属于未能保留中国文化内涵与语言形式的归化策略,共计44例,占19.8%;直译、音译等属于保留中国文化内涵和语言形式的异化策略,共计178例,占80.2%,远远超过了归化策略使用的比例。由此可见,沙博理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中更多地采用异化策略,或保留中国语言形式,或忠实传达中国文化意象与内涵,或两者同时具备。

二 明晰的读者意识

沙博理认为文学翻译既要忠实传达原作的内容与风格,又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与兴趣。^[2]沙博理自身具有的西方读者阅读习惯与西方

语言文化资本使其在对英语读者接受能力与兴趣的把握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知道英语读者喜欢什么样的文学作品,熟悉西方文学作品地道的语言表达及篇章结构规范,因而其翻译具有明晰的读者意识。明晰的读者意识使其在翻译中时刻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降低译文的理解难度。这种明晰的读者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对英语篇章布局规范的遵守、对原文语义的显化和对原文词句等的简化。

(一) 英语篇章布局规范的遵守

在小说的篇章翻译上,沙博理在忠实于原作内容的前提下,尽量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接受能力。因此,沙博理在篇章结构与内容的布局,即语篇组织的宏观模式上,尽量使译文符合英语的语言规范。衔接与连贯是英语语篇的两个基本属性,主位-述位的反复衔接是实现英语语篇衔接和连贯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主题句与主题段落是实现主位衔接的有效手段。^[6]沙博理采用增译、改译等技巧,增加主题句和主题段落,或将原文中已有的主题句移至译文句首,以达到英语语篇的主位衔接。为了使译文具有英语语篇的衔接与连贯效果,沙博理还改变句子与段落的顺序,重组译文篇章内容。此外,遵守英语中的分段规范,即一个主题一个段落,也是沙博理在翻译中遵守英语语言规范的一种手段。

(二) 语义层面的显化

沙博理并非拘泥于对原作亦步亦趋的形式上的对应,而是通过增译等翻译方法与技巧突出语境、文化因素,增加译文的可理解性。这些增译的信息以文内注释、括号注释、脚注、索引等副文本的形式存在。沙博理的显化策略主要包括时间与地点等的具体化、人物身份与人际关系的明晰化、逻辑关系的清晰化、感情色彩的明朗化等。

人物身份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物的性格特点。为了让目的语读者更透彻理解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沙博理不时插入话语解释人物的身份。沙博理对人物身份的明晰化主要以文内注释的形式呈现,偶尔使用括号注释。如“田英和陈大姐”被译为“her friends from the cadre school—Tien and the teacher Miss Chen”,增加了“her friends from the cadre school”(党校的朋友)来补全第二回语境中出现的信

息,帮助读者理解这两人与小梅的关系;“郝治平”被译为“Hao Zhiping (Luo's wife)”,增加了

“Luo's wife”(罗瑞卿的夫人)来明晰“郝治平”的身份。沙博理时刻考虑读者的阅读体验,在译文中补充上文语境曾经出现甚至原文中并未出现过的时间、地点、距离等背景信息,使读者在获知故事发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前提下,更透彻、轻松地理解文本故事。如“鼓浪屿”被译为“Gulangyu—just across the strait from Xiamen”,增加了文化语境中的信息“just across the strait from Xiamen”(与厦门隔着海峡相望),告知目的语读者鼓浪屿与故事发生的地点厦门的具体位置关系。

沙博理还在译文中增加文内注释来显化中国特有的文化内涵,包括语言文化内涵、命名文化内涵、礼仪文化内涵等。如“上面”(即餐桌上正对门的上席)被译为“on the side farthest from the door—the seats of honour”,以“the seats of honour”(尊贵的席位)解释中国的餐桌文化;“富县”被译为“Fuxian County. Fu means prosperous”显化了汉字“富”所承载的特殊意义,使目的语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汉字文化。

增加感情色彩词汇是沙博理在翻译中使用的重要技巧之一,其目的是希望目的语读者能体验到隐藏在原作人物心中以及作者字里行间的感情。如“少女”被译为“pretty bondmaid”,增加了“pretty”来显化觉慧脑海中少女鸣凤的美丽形象。

(三) 词句层面的简化

沙博理在翻译中,有意识地从译语中可能的对等词汇与句法中选择更为简洁的词汇、句型结构等,以简化译文的词句表达。通过对比分析沙译本和其他译本,不难看出,沙博理的译文词汇更大众化、多样化,句子结构更简单、通俗易懂,翻译语言更简洁明快、活泼有力。

沙博理在词句层面的简化是通过尽量产出易于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的译文以达到忠实于原作思想与内容的目的。沙博理翻译词句层面的简化主要表现在对原作累赘内容的删减与浓缩、简洁凝练与大众化词汇的使用以及长句短译等翻译技巧上。

在词语层面,沙博理用词简短精炼。一般情况下,能用一个词表达,沙博理就不会用两个词或更多的词;能用一个短的词语表达,就不会用一个长的词语。此外,大量大众化词语的使用是沙博理词语层面通俗化策略的另一个明显特征。下文将从

词语的简短精炼与通俗易懂这两个层面,对比随机抽取的沙博理英译的三部文学作品(《小二黑结婚》《延安人》和《鸢鹭湖的忧郁》)与其他译本,分析沙博理词语层面简化的具体表现。

沙博理较之其他译者更侧重译文中词语的通俗易懂,具体表现在沙博理使用通俗化、大众化等浅显易懂的词语,大量使用口语词汇以及注意精简用词。

(1)善于并倾向于使用单个词语尤其是简短、精炼的动词。在动词的选择方面,在表示同一个意思的单个动词与动词词组之间,沙博理倾向于选择单个动词。如沙博理选择“scream”而非“cry out”,选择“tussle”而非“get into a tussle”,选择“cradle”而非“clasp... in one's arms”等。动词的单个词语的选择还表现在沙博理善于运用不及物动词,如沙博理选择“eyes widen”而非“open one's eyes wide”等。

(2)巧妙使用形容词。形容词的准确使用避免了冗长的定语从句、后置定语、短句等。例如“empty”的使用避免了定语从句“where nothing had come up”,“frosted”的使用避免了后置定语“covered with a layer of frost”,“prudent”的使用避免了句子“never allowed anyone to take liberties”等。

(3)倾向于使用 little, no 等否定词和 -less 等否定后缀而非助动词 + not。如将“不十分了解”翻译成“know little about”而非“do not know much about”,将“不知道怎么办是好”翻译成“helpless”而非“not know what to do”等。

(4)避免使用可有可无的词语。如将“两三岁”翻译成“two or three”而非“two or three years old”。

(5)使用其他简短精炼而又传神的词语翻译。如将“帮虎吃食”翻译成“play jackal to the tiger”而非“help the tiger to pounce on its victims”,将“抱着步枪”翻译成“cradle his rifle”而非“clasp the rifle in his arms”等。

句子与句群层面的简洁化策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一个长句切分成多个短句;二是将几个句子浓缩成一个句子。短句结构简单,表意明确,便于读者理解。另外,对于一些与情节发展不太相关、读者也不太感兴趣的环境描写,沙博理往往用一句话进行概括,这样既保留了原意,又简洁明了。

三 适度的调和之举

沙博理在翻译中为了忠实于原作又照顾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接受能力,对译文的忠实性与可接受性进行了适度调和。此外,沙博理在翻译中还努力调和中西语言与文化的差异。

(一)译文忠实性与可接受性的适度调和

沙博理认为译者应在忠实性与可接受性之间寻求平衡。译者不能为了一味地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而牺牲对原作内容与风格的忠实,也不能为了一味地忠实于原作而牺牲译文的流畅性。译者必须把握忠实与易懂之间的度,这种度的把握体现在沙博理的适度调和之举,即在忠实于原作的前提下,对原作的语言形式进行适度的“叛逆”,以使译文更易于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

沙博理在忠实于原作的同时,不忘通过对原文形式进行适度调整来照顾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如在忠实于原作情节的前提下,删除部分冗余内容,以便读者能更轻松地阅读;通过增译来显化原作中的语义信息,以便于读者更透彻、清楚地理解原文,使译文既忠实于原作又语言流畅。

沙博理对译文忠实性与可接受性的调和之举在其翻译中体现较多。

在诗歌翻译中,沙博理通过适度的“叛逆”,努力保留汉诗的意美、音美与形美。在翻译袁水拍的政治讽喻诗时,沙博理将其认为累赘的内容进行了删减与浓缩,如《大胆老面皮》这种包含八节的诗歌被节译成了五节,包含九节的《“我们的信仰”》被浓缩成了三节等。尽管如此,诗歌的意义与神韵仍然得到了比较完整的保留。同时,沙博理以诗译诗,在句长、节奏、押韵等方面基本上做到了与原诗大体一致。在某些政治讽喻诗的翻译中,沙博理只是稍微调整句子结构就获得了忠实传达原诗歌“三美”的效果。

在题名的翻译中,沙博理也运用调和技巧,翻译出既忠实于原作又能满足目的语读者期待的好译名。沙博理翻译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以及大部分现当代小说、散文、诗歌等的题名都以写实为主,符合西方题名的特点;而且题名中极少使用修辞与典故,语言的形式与其所表达的内容一致,即题名的表面意义与深层意义一致。沙博理对这部分题名采取了直译的方法,达到既忠实于原题名又切合目的语读者阅读与审美习惯的双重效果。对于不

适合直译的题名,沙博理则采用增译、减译、改译、换译等多种技巧进行意译。对于直接揭示原作主题与内容的文学作品的题名,沙博理仅仅在原题名的基础上使用增译、减译、改译等技巧,将原题名简化、归化、明晰化、具体化。经沙博理适度“叛逆”之后的题名更易于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比原题名更具有吸引力。至于那些并非紧扣主题的以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命名的题名,沙博理则对原题名的内容与形式采取完全“叛逆”的方式,采用换译的技巧,在原作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启用更紧扣原作内容与主题的新题名。

(二) 中西语言与文化的适度调和

1. 汉英句法结构的调和

中西思维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人秉持天人合一、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而西方强调人的个体意识,崇尚个体思维。这种差异导致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形合是指“句中的词语或分句之间用语言形式手段(如关联词)连接起来,表达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意合是指“词语成分之间不用语言形式手段连接,句中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通过词语或分句的含义表达”。^[7]英语造句注重句子形式,结构完整,以形显义,呈现树形结构,英语句法的连接词包括关系词、关联词、介词、非限定动词等;汉语造句少用甚至不用连接手段,注重事理顺序,以神统形,多呈现竹形结构。英汉句法除了形合与意合的差别之外,在“重量”上也有一定的差异。^[8]如果以谓语为中心划分汉英句子的“重量”,汉语句子的前端更重,遵循“前端重量原则”,而英语句子的后端更重,遵循“末端重量原则”。

沙博理在翻译中采取折衷与融合的方法来调和英汉语中这种句法结构与句子重量的差异,即将形合与意合相融合,将前端与末端重量原则折衷为两端重量均衡的原则。沙博理的这一调和技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译文中大量使用游离句。游离句是一种特殊句子,其句中的一个成分脱离本来的位置,句法上独立于句子之外,以逗号或破折号隔开,语义上与句子紧密相连,可以位于句首、句中、句末。^[9]游离句同时存在于汉语与英语当中,也是现代英语中比较常见的句法结构之一。使用英语的游离句能突破汉英语言差异的障碍,成为译者调和汉英句法的重要手段。^[10]首先,英语游离句具有意合的句法特点,因为游离成分多数是起状语作用的,隐含“因为”“虽然”“如果”等连接词,无需增加

because, since, as, tough 等连接词就能将句子的逻辑关系表达出来。如“我因为是城市生长的,对农活没有经验”,可译为“City-born and bred, I had no experience in farming”。^[10]这种句法特点使得译文中出现更多意合的句子,保留了汉语意合的句法特征。其次,游离成分可以位于句首、句中和句末,其位置比较灵活,可以均匀分配句子重量,而非一味地遵循“句末重量原则”。再次,游离句在现代英语当中具有广泛应用,且具有简洁、流畅、生动等修辞特点,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更容易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与接受。

沙博理在译文中大量使用游离句,一般都将游离成分置于句首,以平衡句子“重量”,避免因英语的“句末重量原则”而造成的句子“重量”失衡,同时也照顾到汉语的“句首重量原则”。游离句除了语言简练与紧凑流畅等特点之外,还因其强调句中某一部分,能收到强调突出的效果。沙博理经常将句中的部分形容词、副词等独立出来,加以强调。游离句在沙博理的译作中大量存在。本文选择沙博理五部短篇小说《延安人》《小二黑结婚》《鸳鸯湖的忧郁》《长长的流水》《套不住的手》以及一部长篇小说《创业史》第八章的英译本,与他译本中游离句的具体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具体分析了游离句的数量、游离成分的分类及游离成分在句中的位置情况,结果发现:六个沙译本中游离句的总量为202个,而其他译本中游离句的总量才96个。此外,沙译本与他译本中游离成分的位置差异显著。沙译本游离成分一半以上都置于句首,而他译本大体均匀分布。从单个译本来看,除《套不住的手》外,其他五个沙译本中游离句的数量一般在他译本数量的两倍以上。每个沙译本中游离成分前置的游离句数量远远超过后置与居中的游离句数量,他译本中游离成分后置的游离句居多。沙译本与他译本游离成分的位置差异表明沙博理更注重平衡句子的“重量”,避免英语重“句子末端重量”而导致的译文中句子末端偏重。沙博理对汉英句法的调和技巧还表现在其将同一个句子中的几个游离成分均匀分布,这种游离句的数量也超过其他人的译本。

2. 中西文化的调和

除了在翻译中对中西语言进行调和之外,沙博理还通过各种方式调和中西文化,包括在译材选择上寻求中美共同的文化精神,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上采用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等。

(1) 译材选择上对中西文化的调和

从《新儿女英雄传》到《活人塘》《小城春秋》《保卫延安》，沙博理倾向于选择中国战争题材小说进行翻译，他认为这类小说中所描述的中国英雄人物的勇气与闯劲，能使人联想到美国的拓荒精神。^[1]¹¹⁸除了战争题材作品之外，沙博理还选择了赵树理的一系列与封建落后思想做斗争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传家宝》等；另外，他还翻译过柳青的《创业史》等。无论是赵树理小说中与封建势力斗争的进步农民李有才、小二黑、小芹、孟祥英等，还是《创业史》中为了创业努力奋斗的年轻党员梁生宝等，他们身上所体现的追求新生活的精神与美国的拓荒精神都极其相似。

(2) 翻译策略上对中西文化的调和

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沙博理对归化与异化策略进行调和，具体表现在：

沙博理在其译作中对同一个文化负载词交叉使用归化与异化策略，如将“菩萨”翻译成“the gods”或“Buddha”，将“老天爷”翻译成“the Old Lord of the Sky”“Heavens”或“the gods”，将“里”翻译成“mile”或“li”，将“元”翻译成“dollar”或“yuan”，将“分”翻译成“cent”或“fen”，将“饺子”翻译成“dumpling”或“jiaozi”。

沙博理在其译作中对同一类文化负载词交叉使用归化与异化策略，如将“虎落平阳”翻译成“put my neck in a noose”(自投罗网)，将“虎落深坑”翻译成“a tiger can't get out of a deep trap”。

沙博理在其译作中对同一个文化负载词同时采用归化与异化策略，如将卢沟桥翻译成“Lukouchiao(Marco Polo Bridge)”，将“饺子”翻译成“jiaozi(dumplings)”，将“围棋”翻译成“weiqi or go chess”。

文学作品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之重要环节。通过对沙博理在50余年的翻译生涯中所体现的翻译观的探究可知，沙博理及其所服务的中国政

府机构立足于准确而有效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为了让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更准确、更有效，笔者认为，沙博理如下翻译观值得中国文化外译者借鉴：立足于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致力于准确而真实地传达中国文化，不能为了经济利益等扭曲中国文化；兼顾对原作的忠实与对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的关照；采取适度的翻译策略，如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文化负载词的音、形、义，合理遵循目的语的篇章布局规范，适当进行语义层面的显化与词句层面的简化，巧妙使用游离句这一英汉语共有的句法结构。同时，中国文化外译者还应具有娴熟的双语双文化能力，能准确把握外汉语言的差异与中外文化的异同，如此，才能最大限度、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 [1] 沙博理. 我的中国[M]. 宋蜀碧, 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
- [2] 沙博理. 中国文学的英文翻译[J]. 中国翻译, 1991(2): 3-4.
- [3] 洪捷. 五十年心血译中国: 翻译大家沙博理先生访谈录[J]. 中国翻译, 2012(4): 62-64.
- [4] 凤子. 迎接新婚: 八十自述之一[M]//凤子. 人间海市.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389.
- [5] SHAPIRO Sidney. A Sampler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Mao Zedong[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96: 1.
- [6] 胡壮麟.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146-149.
- [7] 连淑能. 英汉对比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48.
- [8] 金积令. 汉英词序对比研究句法结构中的前端重量原则和末端重量原则[J]. 外国语, 1998(1): 28-35.
- [9] 吕叔湘, 朱德熙. 语法修辞讲话[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9: 160.
- [10] 张玉民. 汉译英技巧与英语外位结构[M]. 北京: 新时代出版社, 1990: 102.

责任编辑: 徐海燕